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十九）

1966年，我在（北京）东城区女十一中（现165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当时15岁的我非常幼稚地

认为，我们虽然没有赶上父辈们枪林弹雨的革命战争年代，能够赶上“文革”也是荣幸的，自以为成为革命者了。

大约是在7月底8月初的一天下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几个造反派到我们学校来串联，请几位革命小将去帮助他们批判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有电影《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扮演者于是之。平时我看过很多遍《青春之歌》的小说和电影，我非常崇拜里面的革命者卢嘉川、林红，非常喜欢林道静，特别痛恨余永泽，就是因为他把卢嘉川从家里赶走，致使卢被捕。当时我完完全全把演员和所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把于是之当成余永泽，举起剪子把于是之的头发给剪了。当时认为自己干了一件非常革命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年龄及阅历的增长，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年干了一件非常幼稚的错事，成为心中一个结，每当想起就感到后悔与内疚，这件事埋在我心里已34年了。我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回到北京，工作单位就在人艺附近。有多少次，我真想到人艺去找于是之老师当面赔罪，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而今我也是年近五十的人了，不知怎么的，我的这个愿望愈发强烈。我知道他已经退休了，又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我爱人和孩子也鼓励我前去赔礼道歉，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我得知于是之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我怕见到他，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他是个刺激，有损身体。

34年来我一直将道歉深深埋藏在心底：“于是之老师，对不起！请您原谅那个幼稚愚蠢的小姑娘。”在这里祝于是之老师永远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叶继红（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北京）

□ 转载自《海上文坛》（2000年第四期）

~~~~~

【学术争鸣】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

• 云 林 •

一、作为文革研究关键概念的“异端”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文(1)及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2)的面世，标志着“异端”这一文革研究恰切而关键的概念终于进入它的位置。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宋氏论著及其他有关研究文献中(3)，判别文革异端的标准均被不加省查地理解为文革权力中心的反对派；甚至强调文革研究独立立场的杨曦光（小凯）也循此思路而赞同宋氏(4)。

这一流行的理解，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真实并造成学理逻辑上的混乱。

例如，宋文篇首即将“血统论”与“出身论”并举为文革异端思潮代表。但这两种在真实历史中极端敌对、水火不容的“异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统称为“异端”呢？宋氏为此创造了“左”、“右”异端说。但由于“左”、“右”在此纯属表现形式，“异端”定性无别。从而，文革诸派别在宋氏大一统的“异端”抽象下冰炭同器，完全失去了他们对立的历史真实内容。依据反对派即异端的形式主义逻辑，有人甚至推导出更为奇异的结论，宣称林彪才是文革中最大的异端代表，“571工程纪要”是“非毛运动的第一页”(5)。

这种异端观念所遇到的逻辑障碍是，作为异端一反对派前提的文革权力中心事实上并非单一纯粹的参照物：即使将刘、邓、陶与诸老帅乃至林彪、陈伯达等排除在外，作为形式上连贯文革始终的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文革权力中心，其自身频繁剧烈的分裂演变，使文革各个阶段诸种不同角度的反对派很难维持异端的统一性质。宋氏所谓“左”、“右”异端，作为反对派，其矛头即使指向同一对象（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却绝非对象的同一方面或同一阶段，从而这些“异端”思潮的实质内容往往迥异或相反。

深入一步的分析是：由于文革巨大的灾难形象，反文革的异端身分的确认，今日已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攸关道义价值而成为某种资本。宋文称联动“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是文革中的一次正面挑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6）。官修文革史《大动乱的年代》（7）亦持宋文观点，称导致千百万人遭受血腥迫害的谭立夫血统论讲话是“这位当时24岁的大学三年级的年轻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忠诚，讲出了许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他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抵制，今天无疑应该高度评价”；而其替文革“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巨大“红色恐怖”，却仅轻轻一句带过为“谭的讲话也有缺点，则不应苛求”（8）。这种对反文革之异端身分的标榜，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指向后文革时代权威合法性的重构，它代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要求。可以举一例说明的是，在清算文革最为严峻的1978年，大批造反派头头被作为“三种人”清查逮捕的形势下，某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赦免文革中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联动”红卫兵抄家人命案的刑事责任，表面理由涉及“未成年”，而未明言的理由乃是因为他们是反四人帮的。此后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成为中国大陆社会转型中瓜分国有资产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因此，明确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澄清混淆，已超出了梳理文革历史自身的意义。

这一澄清的出发点应是“与‘异端’对举的‘正统’概念；‘异端’恰切的对立面并非特定权力中心，而是‘正统’；‘正统’先于‘异端’；反‘正统’，才是‘异端’的本源与前提。

## 二、作为“正统”根基的阶级斗争观念

在权威型意识形态体制下的社会政治斗争中，正统话语权亦即最高裁判权。50年代初毛泽东以梁漱溟与“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为朋友”的历史，而将与之争论国务的梁突然升级为“用笔杆子杀人”的“反动透顶”的“杀人犯”。同样，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等指控，将胡风等人从“文人小圈子”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在此类用语背后都恃有“正统”最高权威，其特点是：（1）“正统”终归于政治，特别是权力斗争；（2）“正统”根源于奠定现阶段权力归属的斗争及其阶级集团分野。从而，“正统”拥有历史与传统；（3）“正统”伴有强烈的情感性，它不仅显示着握有权力者的至尊权威，而且唤起夺取权力时代与敌手不共戴天的仇恨。

上述原则同样支配着文革的“正统”观念。我们以著名的“赵健民特务案”审查为例。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曾要求中央召开九大或类似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来讨论文革问题。1968年1月2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康生与赵健民交锋，劈头即将问题转向了所谓赵的历史问题。赵一再重申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曾被捕，从来没有自首。康生却死死认定赵是叛徒！由此历史身分引向一个现实结论：“你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40多年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前后共一个多小时（9）。

康、赵对立，本属文革中党内派别之争（或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由于党内斗争保持有基本政治态度的共性，因而双方都拥有“正统”。这不仅限制了争论的激化，也使问题限定于是非认识范围。康生置赵建民于死地的杀手锏，乃是将党内路线斗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阶级斗争。康生撇开矛盾实质所在的文革斗争，而语境突兀地指控赵是叛徒，接着与另外两个关键词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刻骨的阶级仇恨”共同铸成敌我矛盾的语境。在此语境中，赵已被推出党外，成为宿敌“国民党特务”，从而完全失去“正统”凭靠。与之相反，康生在声色俱厉地指控赵为叛徒特务的同时，将赵丧失的“正统”收归于自己。康生正是凭借这一正统地位，才可能重返当初实质性的文革现实争论，斥“叛徒”、“国民党特务”的赵“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这一典型例子，包含着1949年建国以来党内路线斗争或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后，强权胜利者一方普遍的运作逻辑模式：内部矛盾激化——以正统自居而指控现实矛盾的对方为历史上的敌方——将历史上的敌方复原为现实中的对方，即以历史上的敌我矛盾重新定性现实中的内部矛盾而打倒对方。因此，文革的“正统”依据在前文革的“十七年”乃至建党以来四十年的历史中。

中国大陆当代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观念，本质是1949年建国的政权权威合法性观念，它拥有三方面基本资源：（1）人民（以及民族）代表性。新中国终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殖民侵略与从晚清到国民党历届政权压榨民众的历史，这是共产党代表人民与民族巨大的资格证明。（2）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它以最先进的理论体系与世界范围内广大区域的胜利成效而无可匹敌。（3）以争夺政权的国共两党厮杀史为核心的工农与地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史。

在这三项资源中，第三项因直接关系权力财产与牺牲代价（千百万人的生命）而极具情感鼓动性，它虽不明言却是真正实质性的“正统”支柱。

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流派之所以屡克对手而不败，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对上述三项“正统”资源的牢固掌握与娴熟调配运用。

### 三、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文革二重性

文革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二重性，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文革意识形态中。其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文革的正统后盾。它包含着前述正统权威合法性的三项资源，第三项亦即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则是其硬核实体所在。与之相比，“继续革命”之正统合法性，则倚重前两项即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观念。但“继续革命”又是打破既定现状的运动，因而它包含着将革命矛头指向自身限定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继续革命”是文革所有异端得以合法产生与发展的意识形态前提。1949年后中国大陆正统阶级观念所依据的，并非现实的财产占有状况，而是不复存在的历史状况。文革异端空前地翻转了这一正统阶级观念而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阶级观。早在50年代，当杰拉斯（Milovan Djilas）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移用于社会主义自身时，已发现了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脑力劳动者对立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称之为“新阶级”（The New

Class）。“新阶级”观念将统治阶级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划入“新型的剥削阶级”。从而，这一理论根本上剥夺了当权者的权威合法性，而成为“正统”观念最危险的“异端”敌人<sup>(10)</sup>。这也就是权威意识形态体制下异端思潮的起源。因此，造反就是“新阶级”观念的继续革命。文革中，“官僚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大变动”、“巴黎公社式人民政体”、“砸烂旧国家机器”诸异端（所谓“极左

”）思潮，正是“继续革命”所派生出的具体观念。与之相反，一切维护与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捍卫历史现状传统阶级观念与体制的保守派，则是正统派。

就“人民主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三项正统资源而言，文革异端派乃是利用前两项而阐释新的阶级分野与道义根据，从而消解第三项正统；文革正统派所坚持的实质内容则是传统阶级分野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分配体制。简单地说，文革中的极左造反派即异端派，保守派即正统派，并不存在宋文所谓“右翼异端”。严格说，自从1957年党外反右运动与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之后，中国大陆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翼思潮已不可能允许异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出现。

文革集异端与正统于一体的二重性，使文革中的“左”、“右”内涵颇为复杂。“左派”当然是正统，但“左”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便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右派，也不是维护体制现状的保守派。“极左”派则是将“继续革命”推向极端而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正统地位的“形左实右”派，此中之右，乃反共即反正统之“右”，但这一指控所据立场正是保守派立场。文革中与“左派”及“极左派”对立的保守派也被称作右派，但此“右”乃反“继续革命”之“左”而相对为“右”，若从维护传统阶级观念的正统角度看，此保守派之“右”却是守恃“无产阶级专政”之“左”。但如前节所述，由于文革中的正统仍植根于传统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定下从未能真正僭越正统位置，所以，不仅“继续革命”的极左派是那真正的异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个文革也难免异端色彩而终于在日后被否定。

至此我们以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其正统派是以守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点，以“十七年”旧体制为依凭，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级敌人为打击对象的保守派，它不仅包括“血统论”的红卫兵、“联动”与文革初期公开的“保皇派”，而且还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瓦解之后依托某一稳健造反派汇聚为合法革命组织的“新保守派”，如招纳了部分老红卫兵的北京中学生的“四·四”派、聚集于西安交通大学“老造反派”麾下的西安“工总司”、四川“红成”、武汉“百万雄师”、清华“四一四”等。

异端派则是以“继续革命”为大旗、反“十七年”旧体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的造反派，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纠”、“联动”的“四·三派”、“出身论”、湖南“省无联”、川大“八·二六”等激进反体制派。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才会内在地理解“血统论”与“出身论”何以成为文革思潮斗争的焦点。“血统论”在文革前就已存在，其所以在文革中暴烈化与公开制度化（文革前多属“内部政策”），乃是由于面对异端颠覆传统体制的威胁，强化作为正统核心的传统阶级观念是以攻为守的主要手段。但因传统阶级观念已失去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无地的地主、贫困的富农、无产的资本家），故阶级路线命脉只能系于出身。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血统出身几乎已是正统派唯一可凭借的厮杀武器，从而才份外残暴血腥。在此形势下，血统论与反血统论的出身论分别成为正统与异端的思潮集中体现，并成为文革贯串始终的深层矛盾。宋氏等人将二者并列为“异端”，足见歧误之大。

文革中的正统与异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最高权力层各有其依据支持，也均受过打击（文革的反复剧烈震荡正与此有关），这对立的双方都曾既是最高权力层的拥护者又同时是反动派。准确地说，文革中的主题与异端是在不同方面与不同时期分别成为反对派和拥护者的。这一现象表明，并非仅仅在“两个司令部”或“两条路线”的意义上，而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最高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身，就存在着正统与异端的双重性质。

纵观文革全程，毛泽东热烈支持过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的红卫兵，并怂恿他们以“破四旧”的形式将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家家户户，后又因“联动”的强悍保皇态度而将之镇压。与此相比，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支持是文革中更为基本的倾向，它集中体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以及为造反派首次大规模平反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这两个导致造反派兴起的关键性文献中。

“一月革命”夺权则是毛泽东文革造反路线的高潮阶段。但当造反派的“改朝换代”革命威胁到包括毛在内的执政党体制根基“无产阶级专政”时，毛便以对“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的批判与清理阶级队伍来镇压。当面临正统派于“九·一三”事件后稳步获得控制权的威胁时，1975—1976年，江、张、姚、王“四人帮”却重新接过极左派“新阶级”异端理论，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角度，空前明确地将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确定为以法权为基础而占有财富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

毛泽东兼具正统与异端的二重性格，根源1949年建国后毛对社会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的双重概念，以此线索梳理当代中国政治演化史，这是一个远超出本文任务的重大课题。针对宋文的异端分类，在此须作强调的是，宋文列举的文革三大极左思潮（“打倒新生官僚特权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阶级关系大变动论”）其实均直接源自毛泽东及其文革集团。

早在1964年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sup>①</sup>在稍后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毛更明确提出了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文革“十六条”最重要的规定。在1966年8月2日至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称“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sup>②</sup>。1967年“一月革命”中曾命名“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明确提出：“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与“自下而上地”夺权，将之提到巴黎公社原则的当代发展高度……可以说，无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或是康生（接见广西党校系统的讲话，1968）点名的四大极左思潮代表作《省无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今日哥达纲领》<sup>③</sup>、《川大“八·二六”必胜》，其基本理论与关键概念均源自毛泽东（包括更早的中苏论战的《九评》）。至于“阶级关系大变动”及财富、权力的再分配，更直接出自1967年春流传开来，后由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刊布的毛泽东关于《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的评论。因而，象宋著那样将毛泽东简单化为对造反派的谋略利用、夸大文革的权术作用，显然是有违史实的。

然而，无论是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领导集团，或是基层造反派，其异端意向必须以正统性（基本是“人民主权”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两项资源）为合法性前提。毋论“打倒官僚特权阶级”之类极左思潮是“人民主权”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发挥，即使是遇罗克“出身论”这类极少数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异端思想，也依然要以“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之类“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为由，为“一切革命青年”争辩平等权利<sup>④</sup>。由此我们才会深入一步地理解这样一个表面看似奇怪的现象：何以在毛泽东中央文革集团讲话乃至社论、决议公告中，“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帝修反”之类正统口号式字样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地与异端指向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共存。如前所述，如同辱骂中最狠毒的词语或巫术咒语，“国民党”、“反共分子”、“特务”之类名称在当代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中不单指称着敌方的要害，它亦是正统根基所在。因而，在重大决议和关键时刻指控“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不仅是仇恨情绪的发泄，而且是正统资格的占有；在对威胁到体制本身的极左异端时，它作为最严厉的敌我矛盾性是可守护正统；在对

付反文革保守正统派时（如康生击败赵建民所运用的），他又是抢先一步占有正统资格，以保护自己，震慑对手的政治手腕表现。他们都共同地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及其文革领导集团正统一异端二重性。

#### 四、后文革时代：从阶级斗争走向民族主义

从表面上看，文革确乎是正统派的胜利。但文革领导集团之所以失败，早在1967年秋季当局第一次镇压极“左”派而毁其自身社会基础时已成定局。文革当局“左”、“右”轮番打击的后果是，中国大陆各派，无论正统与异端均已不堪压迫。1976年“四五”运动时，当局却已成为众叛亲离的全民公敌。文革领导集团被捕判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对文革的全盘严厉否定，似乎是文革以前十七年正统体制派的胜利。

然而，文革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受诅咒的罪恶灾难化身，这一大陆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恰恰包含着对集正统与异端于一体的文革双重的否弃。正统与异端彼此间的冲突及其共同厄运，以及中国社会在文革中的整体性创伤，使文革运动同时成为对包括“正统”与“异端”在内的中国各阶层、各派别势力的改造。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对文革的全民反省，势必同时是对作为文革重要根源基础的传统体制的反省。从而，1976年不仅是文革的终结，同时也是改革正统旧体制的开端。

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与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地主与富农分子“当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给与多年来遵纪守法的地富反坏份子以社员待遇，他们的子女将不再受歧视与限制而享有公民权。从此，中国大陆不再有作为社会学意识上的敌对阶级（所谓“黑五类”）。

但本文前述三项“正统”资源的分析却表明，这两个看似一般的具体政策文件，实际否弃了当代中国大陆执政党体制赖以行使专政最关键的阶级分野设定，它意味着1949年建国以来“正统”权威合法性三项资源中最为强硬的一项资源在文革以后的失败，继而作为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于90年代后衰落，传统权威结构中仅存“人民—民族”一项。与之相应的是，如果说，为文革异端所执着的“新阶级”当时还是不成熟的特权阶层（王绍光等人所强调的），那么在权力社会向财产社会转换的今日，那个新阶级已趋成熟<sup>(5)</sup>。作为掩护这一要害的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权威合法性的最后支柱。然而，不管怎样，与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这一终止中国封建体制命脉的历史性事件相仿，这两个终结阶级成分的文件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是中国大陆社会现代转型划时代的里程碑。

【注释：】

(1)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以下凡引此文，简称宋文。

(2)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以下凡引此书，简称宋著。

(3) 例如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号。

(4) 参阅杨氏为宋氏所作序一，页1。

(5) 王兆军：《谁杀了林彪》（台北：世界书局，1994），页264。

(6) 同注(1)，页60—61。

(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8)(11)(12) 同注(7)书，页83；589；53。

(9) 引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页274—75。

(10) 杰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捕入狱。该书在前苏联与东欧一直是禁书。该书中译本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1981年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作为与国内非法异端思潮参照的反动作品加按语内部发行，迄今仍属禁书。

(13) 华林山在《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一文中引作《新的哥达纲领批判》，见《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页52。但据我所保存的原始传单，两份不同版本记录均作《今日哥达纲领》。

(14) 无意识形态保护衣的异端很难在中国大陆成为思潮立足，而自始即是专政对象而不是论战的对象。遇罗克被万人大会公判处死，一个致命原因即其淡薄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反动”异端。

(15) 参阅米伸夫对苏联东欧相同情况的分析，参米氏著：《俄国的两次革命：1917与1991》，《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号。

□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

∞ ∞ ∞ ∞ ∞ ∞ ∞ ∞ ∞ ∞

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

• 宋永毅 •

大陆学者云林先生与拙作、拙文商榷的“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读后，〔1〕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他激烈辩驳的“作为文革研究关键概念”的“异端”，而是云文所代表的眼下文革研究中的一些值得警觉的倾向。简言之，我之所以无意与云林先生再商榷“异端”的概念，是因为作为云文论战主要理论对象的“异端”与拙著所界定的“异端思潮”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按拙作的界定，文革中的“异端思潮”主要是指“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毫无疑问，这些孕生流衍于民间的“异端思潮”与中共上层的权力，派别斗争风马牛不相关。为了使这一思潮区别与任何个人的反毛反体制的行动，我进一步说明连张志新、王申酉等人都不在论述范围之内，因为“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2〕不无遗憾的是，云林先生在驳斥“宋氏异端说”时，抽去了主词“思潮”，却把形容词“异端”按他的“形式逻辑”延申为包括任何上层权力斗争中的反对派——从刘邓陶，诸老师到林彪、陈伯达——的另一概念。尽管我颇为赞同云林先生对此类异端说（如“林彪异端说”）的鞅伐，但又不得不申明这实与“宋氏异端思潮”说无关……

与此相反的是，云文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并觉得有必要写下这篇“批评回应”与他作较深入的商讨：

1）造反派、保守派与异端思潮的关系，即时过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是否还应当用文革中的派别斗争的思路来划分、界定与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

2）联动思潮的历史价值，即如何跳出当年派别斗争的巢臼，给这些文革中同样受到毛泽东们大加鞅伐的“右”的“异端思潮”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3）吉拉斯的“新阶级”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异同，即在今天如何清楚地认识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3〕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它对毛权力角逐私利的高度服从性。这里，我还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云先生



狭隘的派别立场与笼而统之的派别分析，导致他的文章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与文革“异端思潮”相关的基本历史事实——这又是当前文革研究中另一个值得一议的倾向。

# ◇ 造反派·保守派·异端思潮

令人微微一惊的是：对文革中“异端思潮”与正统思想的划分，云文仍滞留于三十余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别立场。按云先生的诠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其正统派是以守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点，以‘十七年’旧体制为依凭，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级敌人为打击对象的保守派，它不仅包括‘血统论’的红卫兵，‘联动’与文革初期公开的‘保皇派’，而且还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瓦解之后依托某一稳健造反派聚集为合法革命组织的‘新保守派’，如招纳了部分老红卫兵的北京中学生的‘四·四派’，……异端派则是以‘继续革命’为大旗，反‘十七年’旧体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的造反派，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纠’，‘联动’的‘四三派’，‘出身论’，湖南‘省无联’，川大‘八·二六’等激进反体制派。”〔4〕且不论这种分析在理论上的偏误，就史实而论，它都丧失了历史研究对其的客观真实性的起码要求。

其一，文革中的保守派或‘新保守派’是否只以“‘地富反坏右’传统阶级敌人”为“打击对象”；反之，造反派又是否只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只要稍有历史常识，便可发见这一论断与史实之不符。运动初期风行北京的老红卫兵的“造反歌”的第一句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里的“黑帮”，上自“三家村”，彭罗陆杨，下到被他（她）们残暴地打死的校长和支部书记们，恐怕不是“传统阶级敌人”，只不过是已被宣判的“死老虎”或党内的级别稍低罢了。被云林先生称为“新保守派”的诸派别——无论首都中学的“四·四派”还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的批判从来不遗余力。此外，文革中的造反派对“传统阶级敌人”也从不见得手软。只不过他们崛起于反对走资派和工作组的“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之中，主要的斗争对象有其阶段性的偏重罢了。对于文革中群众中的派别斗争，早就有有识之士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比喻为“比赛革命的革命”，即“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权威支持的竞争。”〔5〕此外，把北京的老红卫兵划为“保守派”也是一个大可商榷的论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只不过他们大都以更正统的立场去造“正统”的反罢了。即便是“批判资反路线”中崛起的群众造反派，他们中虽有原体制的受害者和异端思想的萌生者，但后者却从不是造反派的主流和核心。

其二，云林先生的“派别分析”无视这样一个历史史实：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在其诞生之初便不仅受到保守派的围剿，也同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有时，来自造反派的批判往往更为激烈。而这种思考的超派别性，正是异端思想者们某种自觉非自觉的宝贵追求。“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当时文革中大规模的派别斗争尚未形成。在它流传于民间的1966年底，正是派别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但遇罗克却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关于这一笔名起源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6〕——由此可见，遇罗克一开始就设法使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肤浅的派别干扰。“出身论”刊出后，不仅受到血统论的维护者“联动”等的冲砸，“四四派”的咒骂；同样受到来自“四三派”和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首都三司”的批判。蒯大富就在不同场合骂过“出身论”好几次，并切断过《中学文革报》的印刷纸供应。为此，遇罗克曾愤而下过与蒯公开辩论的“战表”。〔7〕

另一篇文革中异端思潮的杰出代表作，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也有过同样的

遭遇。尽管文章的三个年轻的作者都是广东“红旗派”的革命造反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号称激进的“红旗派”众多造反派头头的激烈批判。日处百万之众围剿中的李一哲们甚至在扼腕痛惜之余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最典型，最忠诚，最坚决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顽固，最反动的保皇派。他们造反，要保卫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毛泽东’专制制度。他们和宣集文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们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8〕此类例证在文革史上并不鲜见。湖南省无联思潮曾为该省最大的激进派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所坚决抵制，〔9〕武汉的“北、决、扬”思潮似乎也并不受该市最激进的“三钢三新”的支持〔10〕。至于北师大井冈山兵团沾有“五·一六思潮”的诸头头们对团内主张“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思潮”的无情围剿；〔11〕上海三个最著名的异端思潮组织“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和“胡守均小集团”，竟自始至终受到来自“红革会”——一个同样因“炮打张春桥”而受迫害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攻击……〔12〕则揭示了不为人注意的异端思潮研究的另一侧面：它们也有高下之分，深浅之别；它们所依托的各派群众组织甚至还有因为派性等原因互相攻讦的一面。由此，也更说明了把对异端思潮的理论分析建筑在当年两派斗争的地基上是何等的脆弱浮泛。

纵观文革的全过程，只要不是至今仍固执于当年的某派立场而一叶障目，便不难清楚地看到文革中的异端思想者从来就是少数，他们中优秀的代表作更从来就代表着一种超派别的独立思考。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文革中的多数的造反派在运动中只注重于打倒某些具体的走资派，并设法使自己或自己这一派取而代之。夺取权力后，造反派头头们又大都迷恋于权力本身，很快成为新官僚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从来没有挑战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只是设法使自己成为毛泽东所建立的更专制的专制制度中的一员。而那些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的则一开始便注目于如何推翻整个特权阶级，改造整个权力机构，并进而用民主与法制来确保人民的平等权利。如果说前者的“反抗”仅是初级的，感情发泄型的，那么后者则是理性的思考，并明显地带有反体制的倾向了。把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说成是“反体制”的“异端派”，其实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人为美化；从而把复杂的历史按当年的派别利益不负责任地简单化了。

◇ 伊林·涤西 v s . 杨曦光；联动 v s . 朱成昭

循云林先生的思路，把上述二组人物放在一起，并研究他们思想的同一性乃至某种超派别的承传性无疑又是一种“冰炭同器”的“学理逻辑上的混乱。”〔13〕因为写作《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伊林·涤西，一向被认为是保守派掀起的“十一月黑风的第一个黑子弹；”〔14〕而写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则是最激进的造反派湖南省无联的思想家。联动是在“批判资反路线”中和造反派，尤其是首都三司极端对立的高干子女组织；而朱成昭却正是被联动多次冲砸，扬言“砸烂”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然而，历史并不是书斋里的学理，对于风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超越常理的矛盾其实正是它蕴含真谛的某种复杂表现形式。

1966年11月15日张贴于清华园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不仅在文革史上第一次正面挑战了林彪制造的个人迷信，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一提法比云文提及的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提法要早得多，比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巴黎公社”的许诺也显得更完整，更激进。因为它已要求对“陈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大的摧毁”和“强大的炮轰”。〔1

5) 耐人寻味的是，这篇“保守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作据说曾经北师大造反派的“新思潮”思想家“李文博所修改”。如果联想到李文博等人早在1966年10月就喊出了完全相同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这一有形的思潮上的承传还是极为可信的。(16)

1968年1月6日，由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系统具体的发挥。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总论下，他已广泛地涉猎了“夺取军权”，“重新建党”等一系列如何砸烂的具体步骤。(17) 只要对这两篇文章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发现其理论主张的同一性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杨曦光后来在回忆他写作过程时也提到了他在北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受到的“批判现存国家机器”的思想的影响，(18) 两者有形无形的思潮上的承传性还是有迹可寻的。

或许，联动思潮对朱成昭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尽管在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十一月黑风”中，朱也带领三司抓过联动。但联动对中央文革一系列出尔反尔行为的公开炮打，对毛泽东的“左倾机会路线”，尤其是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的公开揭露，却都使朱“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19) 1966年12至1967年4月朱开始和联动头头周某某，丁某某，顾某某，彭某某等人密切来往。朱尤其欣赏作为联动思想组织纲领的《秘字003通告》。(20) 在他们对文化革命的共同议论互相影响中，朱和他周围的“一批人”(当然是三司或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们)的思想走得比联动思潮还要远得多。不仅对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集团成员在运动中翻云覆雨，文过饰非的权术手腕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甚至如他自己后来在检查中所说：“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21) 不仅对文革，对整个十七年的中共专制朱也有了独立的理性思考。例如，朱成昭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右派吗？可是就是不承认”；“他们(指中央文革)对三面红旗就是死卡住不承认错。你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过得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讨饭的很多。”(22)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是决不会容忍造反派队伍里有这样一个异端思想家的，朱成昭很快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迫害致死。

如果说从上述两组历史人物的思潮承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什么，那么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固有高下深浅之分，派别对立之争；但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却少有凝固的门户之见。颇具反讽性的是，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比赛革命”的狂热中汲取着对方的“反革命思想”的精华，并使自己的异端思潮日趋成熟起来。这方面，李一哲大字报对省无联思潮的扬弃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按派系划分，省无联与李一哲都属于造反派中的“极左派”的新思潮。但李一哲们已不象省无联那样再主张打倒周恩来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文革集团。王希哲后来解释了这一变化：“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级、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23) 毫无疑问，这一变化代表着李一哲们对人民利益而不只是派别利益的更高思考。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下联动思潮以及被云林先生称为“正统派”或“新保守派”的异端思潮了。云文竭力否认它们是异端，理由是“反文革的异端身分的确认，今日已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攸关道义价值而成为某种资本”。另外，“1978年，大批造反派头头被作为‘三种人’清算逮捕的形势下，

某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赦免文革中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联动’红卫兵抄家人命案的刑事责任，表面理由涉及‘未成年’，而未明言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反四人帮的。”（24）这里，有两点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其一，文革中衍生的异端思潮并不等同于今天才为人们觉悟到的真理。从今天的理论高度回望，事实上也没有一种异端思潮是尽善尽美的。对异端思潮的认定应当只服从于历史的“事实判断”，而不是服从于今日的“道义价值。”共产主义革命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的异端思想，历史研究者们不能因为它今天在道义价值上的普遍被否定而不承认它为历史上的异端。其二，我们不能循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一定要拥护”的思路来研究历史。“某位国家领导人”不公正的荒谬批示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对着干”，把联动重新定为“反动组织”，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保守派”加以一概否定。

不错，联动思潮中血统论部分并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价值。拙作中对它早已有过系统的批判。（25）但把它列为文革中诸多异端思潮的一种只是承认一种史实而无关历史评价与“道义价值”。反之，联动思潮中不少宝贵的思想——如对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文革如“斯大林时期大疯狂”的批判；对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的呐喊等——却不能因此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到垃圾堆里去。尤其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家庭背景，他们对中共上层黑暗面的公开揭发往往异常激烈并有一定的可信度。一方面，这使他们中终于杀出了魏京生这样的彻底叛逆者。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揭露的挑战性与公开性，对于所有卷入文革的群众，都有其心灵的震撼。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文革中异端思想者们和那一代青年的思想成熟过程，便会毋庸置疑地发现：对毛发动文革的实质——作为一种中共上层黑暗、肮脏、残酷的权力斗争的认识，常常是他们醒悟的起点或共同点。笔者在北美采访过不少后来参加地下读书运动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都谈起他们固然是联动血统论的坚决反对者，但联动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揭露，却都使他们对毛泽东们指导文革的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在朦胧中有了一丝疑惑。联动思潮的历史价值由此也略见一斑吧。

最后，云文对拙作把联动思潮称为“右翼异端”颇有微辞，认为“严格地说，1957年党外反右运动与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样的思潮才是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相提并论的右翼异端。云林先生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有史与论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无论是1957年的右派思潮，还是1959年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差之千里。其次，拙作的原文是：“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按云文随后自相矛盾的陈述：“文革中与‘左派’及‘极左派’对立的保守派也被称作右派”。（26）因而此中之“右”，不过是文革中的一种惯称。而云文所表现出的说“右”，一定要右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形态”，道“左”，则只能认定只有“极左派”才是异端派的思维方式却大可商榷。

#### ◇ 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

如果说云林先生在前面两个问题上的偏误主要出自派别立场而导致的对文革异端思潮基本史实与进程的错误描述和判断，那么，当他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论相提并论时，他实在是犯下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误读。云文写道：“‘新阶级’观念将统治阶级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划入‘新型的剥削阶级’。从而，这一理论根本上剥夺了当权者的权威合法性，而成为‘正统’观念最危险的‘异端’敌人。这也正是权威意识形态体制下异端思潮的起源，因此，造反就是‘新阶级’观念的继续革命。”（27）——一言以蔽之，毛的“继续革命”论所煽起的造反运动就是吉拉斯的“新阶级”论的完美实践。云先生的这一基本立论实在是糊涂之见。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一种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开明宗义地说明：“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宗教性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主义”。（28）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恰恰是要维护斯大林主义，建立一个比斯大林更为专制的中国式的封建法西斯的毛专制。由于毛的“继续革命”论本质上是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实用化，无论他本人还是整个文革集团都没有过一篇系统化的论著，而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要点”和“语录”。文革中唯一的一篇公开论述过毛的“继续革命”论的是发表于1967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该文把毛的“继续革命”论归纳为六个“理论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3.“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上述支离破碎并缺乏内在逻辑的“要点”中，第1，2，6点浮泛空洞，第3，4，5点似乎才是该论的重点所在。我们不妨就把它们和吉氏的“新阶级”论作一个粗略的比较。

毛泽东的所谓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全面专政”，其实是为了铲除十七年内有限的文化学术自由，建立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由此，大规模地打击任何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斯大林式的全民洗脑（“接受再教育”和所谓的“斗私，批修”），总之，是为了推行某种思想暴政。而吉拉斯却是这种新阶级的思想文化暴政的坚决反对者。吉氏认为：马克思学说一开始就“特别狭隘而具有排他性”，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完成了对文化艺术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上的专制暴政”（Tyanny over the Mind）。而结果只能是造成“知识的普遍贫乏”和科学，艺术，文学，电影……所有领域的全面大退化。而新阶级“为了他们私利而窒息知识界任何不同的思想以及对思想本身的暴政，将把共产党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9）

吉氏的“新阶级”说把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都认定为“新阶级”，因为他们实际上占有了国家生产资料并剥削压迫人民。这里，吉氏依据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按这一学说，斯大林——毛泽东本人才是这一新阶级的总代表。与此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承认整个中共官僚集团都是“新阶级”。他的“走资派”说首先划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其次，又有所谓“两条路线”之分。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不在“走资派”之列。此外，毛氏的“党内资产阶级”完全按思想意识为依据划分，这样，毛和他的追随者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的政敌，他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党内有自由化倾向的干部打成“走资派”而清洗掉。而根据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毛泽东本人才是这一新阶级最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的共产君主。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王若水，曾发表过不少从纯理论的角度批毛的文章。但最近他在仔细研究了毛对刘少奇等人的“继续革命”的史实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彻悟的结论：“并不是毛泽东先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文革；相反，毛泽东是先要搞文革，然后发明出一套理论，来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泽东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因此才要打倒他；而是毛泽东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打倒刘少奇，因此才给他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30）对堂皇的革命理论掩盖下的肮脏的权力角逐，吉拉斯的《新阶级》也有过相似的洞见。他在揭露了当年斯大林为了争夺苏共的最高权力不惜诬陷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为“间谍”、“特务”后写道：“即使他们没有这种主观愿望，共产党人都必须是占有者和专制暴君，并为了这一目的而不择任何手段。这是因为是这一制度本身在迫使

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尤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在道德，理性运动的外表下不择手段。”（31）无论对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对它的翻版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王氏、吉氏的见解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皮相看去，毛泽东想用群众运动来消灭或限制走资派。但如上所述，毛氏的“走资派”的概念其实是吉氏“新阶级”论的一种理论偷换。虽然这种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异端思潮的孕生，但就其总体来说，常常沦为专制者建立新暴政的一种工具。“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使群众暴力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合法化……利用，操纵群众运动都成了党内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的狂潮。”（32）与此截然相反，吉氏的《新阶级》表现出对新阶级的群众性暴力深恶痛绝。虽然吉氏无法预料到数十年后的文革，但他在书中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之口嘲讽过在“专制暴政”下追求“平等”，参与群众性暴力的“奴隶”们：“在这一社会里，……群众都是奴隶并平等于他们的奴隶地位。但为了这一伟大的平等，他（们）甚至不惜拥护诽谤和谋杀……奴隶必然是平等的，但这里的自由和平等从没有摆脱专制与暴政。”（33）优秀的异端思想者遇罗克对这种群众运动早有清醒的认识。1966年8月3日，他厂里的群众揪斗一个“走资派”，并让他淋在雨中。遇罗克十分不满这种暴力形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尽管遇对这个“走资派”平时养尊处优，搞空头政治，为一己私利服务不满，但他更不满群众的造反内容：“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篡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34）遇罗克的不满其实正抓住了这种毛式群众运动的要害：其一，暴力迫害的形式；其二，内容上要建立比“空头政治”更荒唐的个人迷信与独裁。

如果说上面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与吉拉斯的更本不同，那么当云林先把“继续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异端”来论述时，足见歧误之大。另一个异端思想者王希哲在他那篇著名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总结毛的继续革命论的欺骗性以及和群众运动的关系的：

毛泽东并不讨厌这个制度。前面说了，他只不过嫌党内总是存在着一股反对的力量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人民。他要清除这个反对力量。但到哪里去找支持他的力量呢？我们已经知道一九六二年在党内的合法斗争的轨道上，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毛泽东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35）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当年那些优秀的异端思想者们大多是清醒的，而今天的云林先生却仍书卷气实足。

〔注释：〕

（1）云林先生的文章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号。以下凡引此文，简称云文。

（2）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页13—14。

（3）关于这一命题的提出，见龚小夏中文论文“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载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Pleasant Hill, CA: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页316—33

1. 对此更详细的论述，见她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Repressive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Victimization: Patronage and Persec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4) 同注(1)，页67。

(5) 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北京之春》(纽约)，1996年6月号，页18—23。

(6) 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北京)，1980年9月21—22日。

(7) 见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载《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页174—175；陶洛诵：“我和遇罗克的一家”，《中国之春》(纽约)1988年7月，84页。

(8) 王希哲《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1996年，页127。

(9) 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早在1967年8月12日，11月24日(康生等人公开在全国范围内点名批判“省无联思潮”半年之前)就多次发表公开声明批判省无联，指责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径。可参见“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罪恶史”(长沙：《湖南简讯》编辑组)，1968年2月20日。

(10) 据笔者1997年2月对原武汉“新华工”成员，旅美作家徐明旭先生的访谈，他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原武汉“新华工”的造反派头头将北决、扬、思潮的代表人物鲁礼安等人打成反动学生，并残酷批斗的过程。这也可参阅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09—221。

(11) 参见北师大《井冈山》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12) 同注(2)，页417—424。

(13) 同注(1)。

(14)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兵团印)，页130。

(15) 同注(2)，页233—240。

(16) 红色游击队：“从四个回合的斗争看兵团‘新思潮’反动本质”，《井冈山》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10日。

(17) 同注(2)，页274—299。

(18)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国之春》(纽约)，1990年12月号，页66—69。

(19) 朱成昭：“我的检查与交代(1967.8.15)”(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印)，页3。

(20) 据国内学者印红标教授的考证，这一通告的作者似不是北京联动成员而极可能为各省市的联动成员。但这一通告仍是联动思潮的思想纲领之一。

(21) “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红鹰》(北京轻工业学院红鹰兵团主办)，1967年8月31日。

(22) 同注(19)，页9。

(23) 地质东方红“红色造反团”，“620革命造反兵团”：“再版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内部参考》，02期(北京：清华井冈山作战部第四动态组)，页5。

(24) 同注(1)，页64—65。

(25) 同注(2)，页20，24—25，30—32，77—82。

(26) (27) 同注(1)，页66—67。

(28)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

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r, 1957 vi -vii.

〔29〕〔31〕〔33〕同注〔28〕，页146，151，163。

〔30〕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我的一些看法”。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10月，页30。

〔32〕同注〔3〕，页327—328。

〔34〕同注〔6〕。

〔35〕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08。

□ 寄自美国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之四）

• 常 仁 •

五、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了最为方便的攻击武器。

冷战的结束，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一心要保持世界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转而把在美苏对抗中一度视为“盟友”的中国，看成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对手之一。为适应这样一种战略目标的转换，美国媒介需要一个最顺手、最能得到各方呼应的目标，来“妖魔化”中国；这个最佳目标，就是中国自己大兴批判讨伐之罪的文革。从《上海的生与死》、《鸿》之类以偏概全的文革传记小说在西方世界粉墨登场之后，经过中、台、港和西方人士持续的“联合大批判”，文革就逐步成了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纳粹运动，毛泽东就成了希特勒的代名词。在这种感觉下，美国当局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进行一下导弹袭击，美国大多数民众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过分。而竟好像是有意配合美国的战略意图似的，中国的主流媒介、爱国的自由派人士，却和海外民运分子及台独分子一起，积极而不可思议地一起制造文革是一场空前人类浩劫的舆论空气。他们中的激进者不仅仅把矛头指向文革，而非要借着文革把中华民族的祖宗八代都彻底搞臭骂透，使中国人在美国人民眼里，成为在必要时可以毫无内疚地从地球上抹掉的劣等民族。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呼吁每一个经过文革的中国人要忏悔，要“拷打自己的灵魂”。请听他们怎么“拷打”的：

“面对文革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所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反省历史中的自己，当然不是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那属于历史总结的范畴，且让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惟有此，我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56〕

这位先生还算客气，他只是用躲躲闪闪的口气，隐晦地点明中华民族在精神和性格上的不健全。

“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57〕

“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

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58〕

这位血气方刚的余杰后俊，却在他责问余秋雨的文章中，把整个中华民族一带骂上了。

——日与月与，曾无日夜。一同轰然崩溃的，竟然还有数亿幸存者对那场史无前例劫难的记忆世界。文革是民族公耻。整个民族在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集体地盲目遗忘、善于遗忘甚至蓄意遗忘文革，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远、惊心 and 具有历史性的天下公耻。知耻不耻，至耻何堪。……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然而，我们更是文革最主要、最坚决、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无不自我屠杀他人的灵魂，没有谁坚守诚实、良知、人格与尊严，没有谁自救，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我们本是天然地缺少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和钙质的一代，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思想改造”，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而且在“彻底埋葬封资修”的激狂中主动地、自觉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切断自己的一切文化根基。我们反文化、反科学、反历史、反现代文明，亲手将谎言抬入旗帜，抬上太阳和奠坛。我们拥护和实践着当权者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武化，以民主的名义消灭民权，以真理的名义偷换迷信，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沉重枷锁于人民。……我们告密、检举、造谣、中伤，自认为是反戈一击。我们向亲生父母宣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自以为是大义灭亲。我们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殴打老师，批斗同胞，花样翻新地制造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冤案，甚至趾高气扬地叫喊“踏平白宫，光复红场”。我们北上、南下、东进、西征，所到之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通牒、布告、标语、勒令、呼吁书铺天盖地，弹壁、残垣、血泊、废墟触目惊心。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同室操戈的恐怖中，又灭绝人性地制造骨肉相残的无尽恐怖。我们聒噪，嗡嗡，为拥有超国家、超道德、超法律的绝对权力者更加拥有绝对真理而横扫一切，张扬奴性与兽性几近极致。我们以血腥的光荣、庄严的丑陋、伟大的罪孽，将大好河山糟蹋成万劫不复的地狱，并且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如果不是一个运动向一个又一个运动转移，我们这一代人中将无可争议地产生一批希特勒分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从无自审和自问：我们曾经是什么？干的是什么？供奉过什么？自以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不必讳莫如深——我们不过是数千年人治历史衍化而来的最盲目拜权的生物，是古老而畸形的阴柔文化痼疾上的新伤口，是亘古的历史闹剧推陈出新后自命不凡的浅薄戏子，是灵魂屠场里自我阉割和阉割他人的凶手，是粗俗的、躁动的、混乱的、具有巫术色彩和天人政教合一化的、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现代个人迷信信徒，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代表，是一代代农民式的非理想主义在当代的表现，是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是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精神流浪汉，是卑琐、麻木、盲从、怯懦、安命而又自恋、自渎、自慰、自怜却不知自省自新的化身，是任凭世纪更迭、沧桑迁化也将永恒在人类记忆中的耻辱。谁为之，令我一代人至此极也一任时光流失，文革浩劫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59〕

这两位显然是身居海外的文革声讨者，在酣畅淋漓的破口大骂中，那些“反现代文明，”、“踏平白宫……”、“希特勒分子”……等等之类的用词，跟美国战略家的意图似乎是更贴近了。而在这骇人听闻的一连串指控中，提到是谁在压迫和残害谁了吗？没有。因为作者意在抹黑整个民族，而并不想揭露追究哪个真正的罪人。有一星点理性的回顾、分析和总结，涉及促使人们激狂、蠢动、凶手、劫难的社会矛盾和内在政治原因了吗？没有。因为剖析原因、总结教训以防治灾难的重演，根本就不是作者的目的。

这还不够。更有人要用“仅仅一个细节”，来“揭示全部历史真实”。而这个细节，就是声称有一个才18岁的小丫头，“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没几下，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而在一家医院的手

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作者借此要揭示的“全部历史真实”就是：中国人：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

姑且不论，中国第一例活人肾脏的移植发生在1972年，而且为了克服抗体反应，必须在近亲之间移植才能成功；就算这是事实，就应该以此否定整个民族、否定整个文明吗？正如王小东在一封通信中愤怒指出的那样：

“哪个民族、哪一种文明没有过类似的对内对外的残忍行为？项羽那个时代他都提到了。那我就建议他这个历史学家，他这个提到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欧洲文化、近代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学家去好好读一读罗马史。在罗马的一些历史阶段，曾有过非常类似于中国文革的做法，甚至比文革还凶。当然当然，时间差了2000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文革更坏。但当我们评论一个文明的时候，只用一个如此小的时段去判定如此长的时段，这是一种严肃的治史态度吗？为什么这些混蛋知识分子如此无知，或者说如此缺德？

“当然这又是八十年代的那一套思想。我看持有这些思想的人不会比文革中做出残忍行为的那些人更好：既然中国人是一种下流的尊严、一种下流的文明，当然对于他们再次施以残忍是完全可以的了，只要有机会。这就是八十年代那套思想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在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显现得很清楚：因为中国人是如此之下贱，因此，这些精英干什么坏事都是正当的了。我经常听到那些精英、那些权贵用这一理由为自己及别的精英、权贵的恶行辩护，为美国人，甚至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辩护。”〔60〕

我觉得王小东最后一段话，特别地关键。从这段话里，可以引申出两层重要的意思来：一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低贱下流”，暴富新贵们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二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整体精神素质上的“低贱下流”，新贵们的美国主子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中国列入“流氓国家”之列随时施行“外科手术”。一切对中华民族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具有现实了解和抱有真切关怀忧思的中国人，都应该精心想想：通过对文革不作具体分析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全盘批判否定，是谁给刽子手冒充“外科大夫”的杀人图谋，提供了道德依据？是谁给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行为，提供了振振有辞的“避难”口实？

（三）

我们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和台独分子利用文革“妖魔化”中国的图谋，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必总结有关文革灾难的沉痛教训。除了文革发起者和领导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之外，在造成或扩大这一灾难中起过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作用的每个人，不能因为国内外别有用心者叫嚷中华民族应该集体忏悔，而不忏悔自己个人所犯的错误甚至罪孽。但是这种忏悔，必须在搞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严格界定谁该忏悔？忏悔什么？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让全民族所有成员来为一部分人的胡作非为和历史错误忏悔，不仅毫无道理，几乎是一种居心叵测。在我看来，如果按时间顺序而不是从性质轻重来排列，以下十种对象，对造成和扩大文革的灾难动乱，或多或少负有责任；他们理应忏悔。

一、所有在文革以前习惯做官当老爷、依仗人民给予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领导，应该忏悔。没有这一类当官者的胡作非为，上不会有毛泽东异想天开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中国拖向一个劫难丛生的深渊；下不会有民怨积愤，为毛泽东启动这场灾难准备了群起造反的必要民众条件。我知道当时确实有一些单位，因为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当官的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绝少有人出来造反，保守派的阵营始终十分强大。

二、反右扩大化的事情中央已经认了错，凡在文革初期对心中有一点不满、提过一丁点儿意见、或头上有根“辫子”、或“出身有点问题”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群众，当作“右派”或“反党分子”来打击镇压的每一个领导干部，也该忏悔认错！没有你们这样小题大作，捕风捉影，以整人压人为能事，干群矛盾决不会那么激化；中央文革怎么煽动号召革命造反，恐怕也只能在一片“保守派”的汪洋大海前自找没趣。你们的行为，为文革派别斗争的起源和恶化，种下了祸根。

三、凡打着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在文革初期和“破四旧”运动中肆行暴虐、残害无辜的人，不管你们现在身处什么位置和境遇，必须忏悔！为构筑中华民族不再重兴暴戾血光之气的心理和精神屏障，这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四、凡在六七年借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泄愤报复、胡作非为、以暴易暴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人士的造反派成员，应该忏悔！你们的行为，对强化对立派干部群众的抵触情绪和仇恨心理，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类鼠目寸光、缺乏宽恕谅解精神的流氓无产者行为，既败坏了造反派的名声，也为后来怨怨相报，最终使你们自己坠入被“秋后算帐”的悲惨命运，准备了冷酷无情的对手。

五、凡在文革中“受血统论”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太强的支左军代表同志，你们偏听偏信了保守派群众的指责控告，夸大了造反派群众的缺点、错误和问题，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工具对付人民中的造反派群众和干部，应该忏悔！你们的做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激化了人民军队和亿万造反派群众的关系，打乱了原定的文革部署，为后来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增添了复杂的政治因素。

六、在六七年中已经得到平反而重振旗鼓的造反派中，凡不懂得国家需要安定、政治需要妥协和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头头们，你们发动的“揪军内一小撮”行动愚不可及。你们原该得理让人，顾全大局，注意团结原保守派广大干部群众，理解他们的感情和尊重他们的革命权利，不要把他们文革初期的过火行为视作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该把冲垮打散他们的组织，作为求取自我生存的前提；你们既不具备冷静成熟的政治头脑，又不具备一个真正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胸怀，结果葬送了扩大巩固社会主义大民主成果的最佳机会，因此也应忏悔！

七、在上述同一时期已经换上了“造反派”旗号的保守派头头们，你们既然已经把自己当作了造反派，就不应该对文革初期受到你们压制打击的老造反派，仍然视作“二等公民”和“翻天右派”。对于“一月夺权”时期受到的冲击和批斗，本来应该抱着将心比心的态度，总结自己文革初期所犯错误的教训，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毛泽东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同时也强调团结和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不能把自己采取过火行动的所有责任，统统都推到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身上。凡是企图以武力压倒对方、并挑起和组织大规模武斗的组织头头，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应该忏悔！

八、凡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伤害无辜、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血腥屠杀的人，不管他们当时和现在是什么身分，都应该忏悔！文革运动最普遍、最疯狂、最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大都发生在这段期间。这些人不承担历史罪责，反而把罪名堆在受他们迫害的造反派头上，乃是最大的文革冤、假、错案，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九、在文革中少数得了势、做了官的造反派（比如上海地区的工总司头头），凡忘记文革“反中共官僚蜕变腐败”初衷、迅速被权力腐蚀而背叛自己底层民众利益立场的人，你们败坏了革命的名声，辜负和嘲弄亿万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正面期待和美好愿望。中国的信仰危机严格地说，是从你们的身上开始的！你们的所作所为，跟

列宁所说的“过去资产阶级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来捞一把”的暴发户心态，并无两致。对于这种忘记自己过去和背叛革命造反初衷的行为，你们必须忏悔！

十、除了正当防卫，一切在文革中行凶施暴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无论处于什么环境条件之下，都应该忏悔！

至于有人作了“数千年人治历史衍化而来的最盲目拜权的生物，是古老而畸形的阴柔文化痼疾上的新伤口，是亘古的历史闹剧推陈出新后自命不凡的浅薄戏子，是灵魂屠场里自我阉割和阉割他人的凶手，是粗俗的、躁动的、混乱的、具有巫术色彩和天人政教合一化的、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现代个人迷信信徒，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代表，是一代代农民式的非理想主义在当代的表现，是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是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精神流浪汉，是卑琐、麻木、盲从、怯懦、安命而又自恋、自渎、自慰、自怜却不知自省自新的化身，是任凭世纪更迭、沧桑迁化也将永恒在人类记忆中的耻辱。……没有谁坚守诚实、良知、人格与尊严，没有谁自救，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61〕等等之类的人和现象，在当今风靡世界的市场金权魔力及其文化的逼迫引诱下，天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该忏悔的忏悔，想自新赶快自新；大可不必专门与文革扯在一起。

忏悔，是目前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一个字眼。它可以虔诚、肃然和代表心灵的真实伤痛，也可以只是轻薄地耍耍嘴皮，更可以是某些“逆向民族主义者”居心叵测的讨伐鞭子；全看它是否跟历史的真实，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对文革历史真实的重新审视，似乎才刚刚迈出了脚步……

〔注释：〕

〔56〕李辉“走出历史的影子”

〔57〕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58〕余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中新社北京三月六日电（记者杨瑞春）

〔59〕岳建一、章德宁“明一代人公耻”——读《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有感，《科学时报》1999年1月17日总第1426期

〔60〕引文出自《黎莲》，见《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人：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华岳论坛关于宋永毅一篇文章的争论及王小东的评论”《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旧版（1）中央王国2000-02-17

〔61〕见注释58

——书于2000年3月5日

（全文完）

□ 寄自加拿大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晓峰（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

及CND提供

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